



脱欧公投十年复盘——多维冲击、双输格局与全球秩序重塑

国际合作部 | 何岩浩

2026 年 9 月 8 日

摘要：

2026 年 6 月 23 日，距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规模最大的逆向选择——英国脱欧公投届满十周年，而就在前一天，英国脱欧公投后第六位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本文基于脱欧公投十年积累的政治经济数据，系统评估了脱欧对英国、欧盟及全球秩序的深远影响。研究发现，脱欧形成了典型的非对称双输格局。其中，英国作为主动方承受了更大比例的绝对损失与更剧烈的政治震荡，欧盟则在财政、制度威信与一体化进程上付出隐性代价。英国未获得脱欧支持者所承诺的净收益，反而双方共同承担了制度割裂带来的交易成本上升与治理效能下降。英国脱欧的后果早已溢出英欧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为全球化退潮时代的一个标志性转折点。它不仅是一次区域一体化的逆向选择，更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从深度互联走向碎片化重组的重要加速器。这一结论对理解区域一体化的不可逆性、经济相互依存的成本与风险以及全球化退潮背景下的治理困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英国脱欧；多维冲击；非对称双输；区域一体化；全球秩序碎片化

正文：

一、引言

2016 年 6 月 23 日，英国以 51.9% 的微弱多数通过脱欧公投，这一结果震惊世界。彼时，欧债危机余波未平，难民潮冲击欧洲大陆，民粹主义浪潮席卷西方，英国社会内部关于移民、主权与分配正义的长期积怨在公投中集中爆发。脱欧阵营以“收回议会主权”“控制边境”“每年节省 80 亿英镑会费”及“独立签订贸易协定”为号召，描绘出“全球英国”的振奋图景。留欧阵营则援引官方测算模型，警告脱欧将导致 GDP 下降、英镑贬值、失业攀升，并削弱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双方论战空前激烈，社会撕裂与政治博弈一度陷入僵局，但最终，这场关于国家命运的抉择以脱欧派的微



弱优势胜出，强行按下了英国脱离欧盟的启动键。

然而，英国脱欧公投仅仅是开端。2017年3月29日英国依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启动脱欧程序，历经两轮脱欧延期与三次议会否决脱欧协议的博弈，直至2020年1月31日英国才以议会多数优势通过脱欧协议，正式终止欧盟成员国身份，进入为期11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英国与欧盟双方围绕未来关系展开拉锯，最终于2020年12月24日达成《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TCA），该协定自2021年1月1日起临时适用、2021年5月1日经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完成批准程序后全面正式生效，而英国也于2020年12月31日同步退出单一市场与关税同盟。从英国公投脱欧到过渡期结束正式脱欧跨越四年半，英欧虽签下《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但在英国本土与北爱尔兰之间的爱尔兰海，形成了一道事实上的海关与监管边界，使得北爱尔兰地方政府“停摆”两年。此后英欧于2023年2月27日达成《温莎框架》以红绿双通道和“斯托蒙特刹车”替代旧规，才使得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重新恢复运转。但刹车机制在2024年3月首次被触发，且温莎框架只是把硬边界变相隐形化，北爱尔兰宪法地位与欧盟规则适用的拉锯仍将长期存在。

十年后的今天，脱离欧盟的法律程序已完结，但经济账、政治账与战略账却在持续累积。英国不再是欧盟单一市场的成员，不再受欧洲法院司法管辖，也不再为欧盟预算缴费。与此同时，它失去了自由贸易的便利、金融通行证的优势，以及作为美欧间“桥梁”的特殊地位。欧盟则失去了联盟内第二大经济体和强大的军事外交力量，其内部权力结构从“三驾马车”收缩为“德法双轴”，财政缺口与一体化方向争议愈发尖锐。

本文基于十年积累的数据与事实，从政治、经济、财政与全球影响等多个维度，系统评估这场分裂对英国、欧盟及世界的影响。当初承诺的“收益”是否兑现？双方各自承担了何种成本？全球秩序因之发生了怎样的偏移？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多维度的系统分析，为理解区域一体化的不可逆性、经济相互依存的成本与风险以及全球化退潮背景下的治理困境，给出一个审慎的答案。

二、脱欧对英国的多维冲击

脱欧公投所揭示的，不仅是英国与欧盟关系的裂痕，更是英国社会内部深层次矛盾的集中爆发。十年过去，英国在政治、经济、金融和财政等多个维度，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与深刻的变革。

（一）政局持续动荡：从“共识政治”到“十年七相”

脱欧公投彻底撕裂了英国传统的政治版图，引发了战后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其直接后果便是政局的长期不稳定。用“十年七任首相”来形容毫不为过，从卡梅伦脱欧公投结果次日的黯然辞职，到特蕾莎·梅的艰难谈判，到鲍里斯·约翰逊的强硬脱欧，再到利兹·特拉斯的“迷你预算”仅45天便引爆债市恐慌、被迫辞职，直至里希·苏纳克的艰难维稳，终因2024年大选惨败交权，随后基尔·斯塔默以“结束混乱、重建国家”为口号携工党重返唐宁街，却在不到两年间因移民与能源政策承压、党内逼宫加剧而于2026年6月黯然离场，此后安迪·伯纳姆通过马克菲尔选区补选重返下议院，当选工党党首，并于2026年7月接任首相，成为脱欧公投十年以来的第七位首相。每一位首相都试图在“脱欧后遗症”与国内治理之间寻找平衡，但均未能彻底解决英国面临的深层结构性问题。

这种频繁的人事更迭，直接导致了政策连贯性的缺失。几乎每一任首相都对脱欧后的英国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路线图，卡梅伦留下的是公投结果和裂痕深重的政治遗产；梅试图以“软脱欧”保留与欧盟的紧密经贸关系，却屡次在议会折戟；约翰逊转向“硬脱欧+大政府开支”，用北爱协议换取脱欧程序快速落地；特拉斯以“小政府+激进减税”彻底颠覆前任路线，但迅速引爆市场恐慌；苏纳克回调至务实紧缩，却又在选举中被选民抛弃；斯塔默以“重建”为名上台，却在移民与能源议题上迅速消耗政治资本；新任首相伯纳姆以“十年使命”纲领提出再工业化与权力下放，试图重塑发展路径，打破脱欧后低增长惯性。十年间，英国对欧关系、贸易战略、财政取向和地区政策经历了至少四到五次根本性转向，几乎没有长期规划能够完整跨越多届政府任期持续落地。这种“一届政府一套蓝图”现象，正是脱欧后英国政治不稳定性的最直接体现。这本身也反映了脱欧后英国政治的新常态——即不再有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人物能够提供稳定且被广泛接受的长期愿景。

（二）经济下滑：从“全球英国”梦想到“增长乏力”现实

脱欧前，英国曾寄希望于“全球英国”的愿景，即摆脱欧盟束缚后，能更灵活地与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签订贸易协定，实现经济腾飞。然而，脱欧却对英国经济造成了结构性、长期性的拖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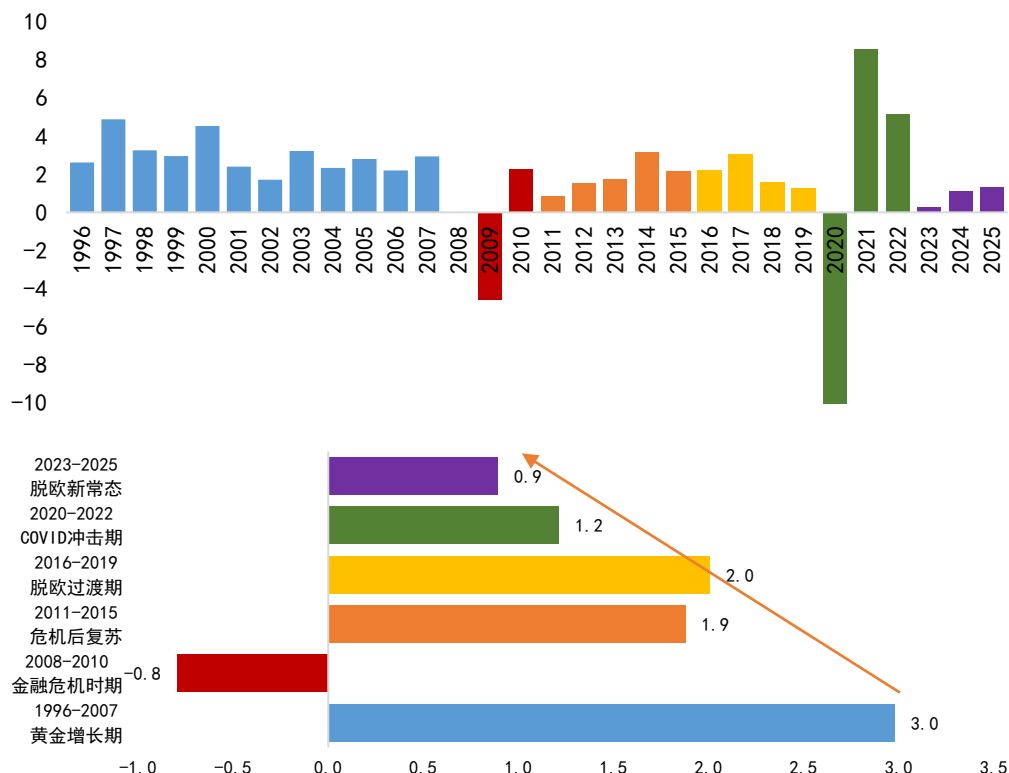
在贸易层面，英国与欧盟之间重新建立了海关检查、监管审批和原产地认证等实质性壁垒，导致对欧贸易成本显著上升、物流效率下降。英国不再是欧盟单一市场的“桥头堡”，对欧出口企业普遍面临更高的合规门槛与更长的交货周期。与此同时，脱欧也削弱了英国作为非欧盟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跳板功能，使其对全球其他地区的贸

易吸引力同步下降。

在投资层面，脱欧带来的长期政策不确定性严重打击了企业信心，英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力出现系统性下滑。2018 年英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首次跌入负值区间，意味着当年外资撤出规模超过了新流入规模，且整体中枢下移，这是近四十年来极为罕见的信号。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脱欧改变了跨国公司对英国的战略定位，伦敦不再是“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门户”，跨国公司将欧洲总部或部分业务从伦敦迁至都柏林、巴黎、法兰克福等地，这种认知一旦逆转，其修复周期远超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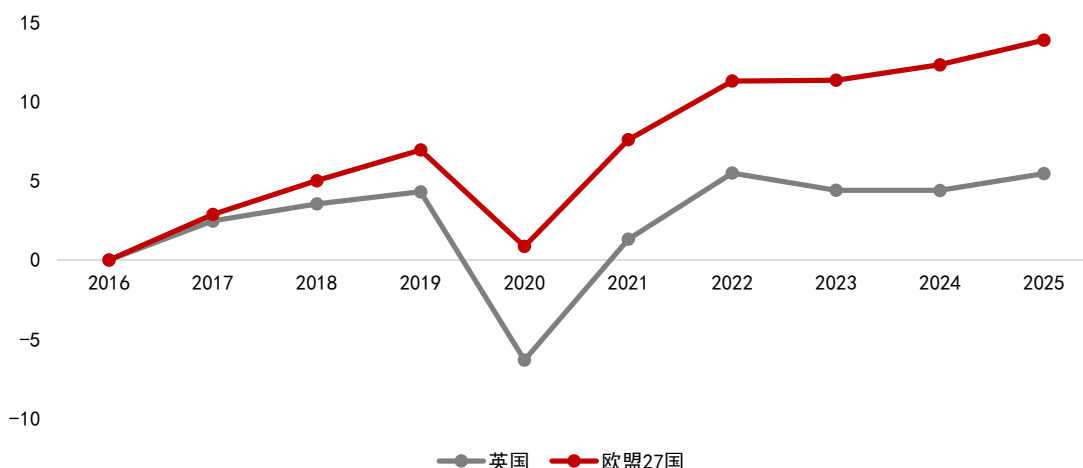
根据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估算，相较于英国继续留在欧盟，脱欧使英国长期生产率至 2035 年下降约 4%，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估算，脱欧使英国经济产出至 2025 年下降了 6%-8%。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潜在增长率趋势本已下行，脱欧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态势，劳动生产率增长在发达国家中长期处于低位，2023-2025 年实际 GDP 增速仅维持在 0.9%的水平。换言之，脱欧并未带来英国增长加速，反而将英国锁入了一个更低的均衡增长轨道。

图 1 英国实际经济增长率 (%)



数据来源：WEO，大公国际整理

图 2 英国与欧盟（27 国）实际人均 GDP 累计增速（%）



数据来源：WEO，大公国际整理

（三）金融业地位下降：从“欧洲金融中心”到“枢纽功能弱化”

伦敦金融城曾是英国脱欧后最引以为傲的“王牌”，其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一度被认为难以撼动。然而，脱欧实实在在地侵蚀了其作为欧洲金融“门户”的功能。

一方面，欧盟明确要求金融市场的清算、交易等核心业务必须在欧盟境内进行，导致大量欧元计价金融业务从伦敦转移至法兰克福、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据伦敦智库 New Financial 追踪与测算，已有超 440 家机构将约 1 万亿英镑资产迁往欧盟。另一方面，英国脱欧后，其与欧盟的金融监管框架不再自动对接，英国的金融机构在欧盟市场开展业务需要获得“等效”认定，但欧盟在授予这些认定上态度谨慎，增加了英国金融业的合规成本和市场准入不确定性。尽管伦敦凭借其深厚的法律、人才和语言优势，依然维持着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它在欧洲金融体系中的核心枢纽功能已被显著削弱。伦敦金融城正试图通过发展金融科技、绿色债券和数字资产监管等新兴领域来重塑竞争力，但这种“转型突围”能否弥补传统欧洲业务的流失，仍有待观察。

（四）财政危局：从“紧缩”到“扩张”的困境与政治危机

脱欧公投之后，英国面临长期经济下行的压力，叠加后续外部冲击，政府被迫大幅扩张财政，但这与其长期尊奉的“财政纪律”传统产生了深刻冲突，这一矛盾最终在 2022 年特拉斯的“迷你预算”危机中全面引爆。

当时，特拉斯政府推出的无资金支持的 450 亿英镑大规模减税计划，因缺乏可信的财政框架而引发市场恐慌，导致英镑兑美元跌至历史低点、英国国债收益率单日飙

升逾 40 个基点，最终迫使英国央行紧急启动购债干预，特拉斯本人也仅执政 45 天便下台。更深层次看，这次危机折射出脱欧后英国财政面临的系统性困境。尽管英国在脱欧后节省了平均每年约 90 亿英镑的欧盟净贡献，但这一“节流”收益远不足以对冲脱欧带来的财政负担。为处理脱欧事务而扩张的公务员体系、新建的边境检查设施及海关 IT 系统，仅截至 2020 年底的直接脱欧准备支出就已超过 40 亿英镑。另外，贸易壁垒上升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税基不断收窄，根据包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内的多方分析指出，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使得英国政府每年可用的公共财政资金减少了约 900 亿英镑。在“全球英国”战略下，政府又需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科技和教育以推动经济转型，以刺激经济增长，这使得财政赤字削减愈发困难。而脱欧后英国国债市场对政治风险极为敏感，投资者对财政纪律的信任已严重削弱，任何缺乏可信支撑的财政扩张计划都可能再度引爆信心危机。

（五）评级下调：从“AAA”到“AA”的信用降级

脱欧带来的长期经济不确定性、政治动荡以及财政风险，直接导致了英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在脱欧公投前，英国是少数几个拥有国际三大“AAA”最高主权信用评级的国家之一。然而，公投后，穆迪、标普和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相继下调了英国的评级。这些评级下调，不仅提高了英国政府的借贷成本，更向全球投资者传递了关于英国经济前景的负面信号，进一步削弱了其作为国际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评级下调是对英国脱欧后“国家信用”的一次综合评估，它反映了市场对英国经济韧性、政策连续性及治理能力的集体性担忧。

三、脱欧对欧盟的深刻影响

英国脱欧对欧盟的冲击，同样深远而复杂。它不仅使欧盟失去一个重要的经济体和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在政治、经济和战略层面，对欧盟的凝聚力和发展方向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全球影响力下滑：从“分量十足”到“权重稀释”

英国脱欧使欧盟在全球经济总量、贸易规模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上均遭受了削弱。英国作为欧盟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前十贸易大国，长期是欧盟拓展全球经贸布局、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支撑力量。英国脱欧后，欧盟 27 国占全球 GDP 的比重从此前 23% 左右，降至约 17%-18% 的区间（按名义汇率计算），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亦同步萎缩。更为关键的是，欧盟失去了英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五个合法拥核国家

之一及北约第二大军费贡献国所提供的硬实力支撑，导致其在联合国、IMF、G20、WTO等核心全球治理平台中的谈判权重、规则塑造能力和议题主导力明显弱化。与此同时，脱欧打破了欧盟内部多元制衡的开放格局，部分成员国贸易保护、本土优先的诉求加速凸显，内部保护主义倾向持续抬头，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欧盟对外自贸谈判、多边合作推进的效率，削弱了其全球化开放标杆的形象。虽然脱欧并非欧盟全球份额下滑的唯一原因，但它直接加速了欧盟在全球多极化格局中权重稀释的趋势，叠加全球南方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美欧竞争加剧的外部环境，让欧盟参与全球竞争、主导区域规则的步伐愈发被动与迟缓。

（二）跨大西洋关系：失去欧美之间的“调解桥梁”

英国在欧盟时，是维系欧美良性互动、缓冲双方分歧的关键桥梁，依托稳固的英美“特殊关系”，英国承担着独一无二的双向沟通、折中调和的角色。一方面，英国精准对接美国政治节奏与外交诉求，向美方传递欧盟的核心底线与整体立场，避免双方因信息错位、认知偏差引发不必要的对抗；另一方面，英国立足自身欧美双重纽带身份，在欧盟内部为对美务实方案争取共识、化解分歧，有效平衡了欧美利益冲突。英国脱欧之后，这一重要的双向缓冲调解角色不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美欧之间灵活斡旋的空间，美欧原有产业、补贴层面的矛盾进一步显性化。从经贸博弈来看，特朗普第一任期推出的钢铝关税、汽车关税威慑，以及拜登政府《通胀削减法案》(IRA)推出的绿色产业本土补贴、新能源贸易壁垒等针对性政策，均对欧盟优势产业形成直接冲击；特朗普第二任期，双方围绕数字规则的博弈成为国际贸易谈判的焦点。缺失英国的居中斡旋后，欧盟被迫采取更为僵化的集体反制应对分歧，难以开展灵活的精准博弈与利益置换，导致美欧在产业补贴规则、绿色贸易标准、科技竞争壁垒、安全经贸协同等核心领域的分歧持续固化、矛盾不断升级，跨大西洋同盟的务实合作基础持续松动。

（三）德法轴心内耗加剧：从“三驾马车”到“德法双轴”的协同困境

脱欧前，德国、英国、法国组成的欧盟“三驾马车”，构建起稳定的内部权力制衡体系，三大核心国家诉求互补、相互约束，有效避免了单一国家或两国同盟垄断欧盟决策的局面，保障了欧盟治理的多元性与平衡性。其中英国扮演关键制衡角色，既会约束德国过度侧重自由贸易、财政紧缩的倾向，也会牵制法国强化产业保护、推进财政一体化的激进诉求，有效平衡了欧盟内部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核心分歧。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内部缺少第三大核心力量的制衡，德法两国原本就存在的理念与利益分

歧，在欧盟决策舞台上进一步凸显，加大部分议题的协调难度。德法两国在欧盟长远发展路径上存在本质分歧，德国坚守稳健的财政纪律，主张延续出口导向、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严控欧盟公共债务扩张，反对过度的区域财政干预；法国则极力推动欧盟战略自主，主张强化欧盟层面财政统筹、产业扶持、贸易保护政策，通过集权化改革提升欧盟整体竞争力。两大核心国在欧盟共同债务发行机制改革、财政规则修订、统一能源政策落地、对华经贸策略调整、产业扶持政策统筹等一系列核心议题中反复博弈，频繁陷入决策停滞。这种常态化的轴心内耗，大幅降低了欧盟应对外部危机、推进一体化改革、参与全球经贸谈判的整体效率，直接削弱了欧盟的内部凝聚力与对外整体议价能力。

（四）经济产出损耗与财政缺口：内部博弈加剧

英国脱欧给欧盟带来了长期性、结构性的经济拖累与财政压力，且负面影响在核心成员国尤其是德国身上体现尤为突出。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中长期宏观建模测算，在英欧《贸易与合作协定》（TCA）常态化运行的基准情景下，脱欧将导致欧盟 27 国长期经济产出较英国留欧的反事实基准低 0.5%-1%，且损失呈现显著的国别分化特征，高度依赖英欧贸易的成员国受损最为明显。其中，作为欧盟经济龙头、对英贸易规模最大的德国，受冲击程度远超欧盟平均水平。德国汽车、精密机械、化工装备等支柱出口产业，长期依托英国市场实现产能释放。脱欧后英欧之间新增的通关核查、合规认证、标准对接等非关税壁垒，大幅抬高了德国企业的出口成本与供应链运维成本，其对英主力出口产业需承担额外的合规与贸易成本，部分中小制造企业因利润压缩、订单延迟被迫收缩英国市场布局，直接拖累德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与出口增速。2016 年英国市场占德国汽车及零部件（HS-87）出口比重约 12.3%，属于德国汽车产业最重要的终端市场之一，大量车企产能、供应链与就业岗位依托英国消费市场，至 2025 年这一份额回落至 8.5%。由此带来的出口损失进一步拖累德国工业产出，传导至欧盟整体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荷兰、爱尔兰和法国等与英国贸易高度关联的国家，均出现贸易收缩、利润承压的问题。

除实体经济损耗外，欧盟财政体系面临刚性缺口与持续内部分化。脱欧前，英国是欧盟核心净出资国，平均每年为欧盟预算提供约 90 亿英镑净贡献，是欧盟财政的重要资金来源。英国脱欧后，这部分稳定预算收入彻底消失，直接导致 2021-2027 年欧盟多年度财政框架出现永久性刚性缺口。为填补预算空缺，欧盟被迫压缩财政投入，同时重启预算分摊比例谈判，进一步激化了欧盟内部南北博弈矛盾。其中，北欧“节

俭型国家”主张严控预算规模、收紧财政支出、严控新增债务，拒绝承担更多出资压力；南欧经济薄弱、高度依赖欧盟补贴的成员国，则坚决反对削减资金，要求提高核心成员国出资比例、扩大欧盟财政统筹力度。持续的预算博弈与利益对立，加剧了欧盟内部分裂态势，叠加长期经济产出损耗、核心产业承压的影响，让欧盟一体化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持续弱化。

四、从“脱欧”到“新常态”的全球秩序重塑

英国脱欧的后果早已溢出英欧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为全球化退潮时代的一个标志性转折点。它不仅是一次区域一体化的逆向选择，更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从深度互联走向碎片化重组的重要加速器。脱欧公投十年后回望，其对全球秩序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一）多边主义的信任危机与全球治理的“空心化”

英国脱欧向世界传递了一个危险信号，即使是高度制度化的区域一体化安排，也可能被国内政治逻辑所颠覆，这一先例削弱了国际社会对多边条约和长期制度承诺的信任基础。在脱欧公投之前，全球多边治理体系已经面临美国单边主义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双重压力；脱欧之后，“制度可逆性”从一个理论命题变为现实案例，进一步动摇了各国对多边合作稳定性的信心。各国转而竞相缔结排他性的区域贸易协定、气候治理领域国际合作的落实更多依赖自愿承诺而非硬性约束、全球税收协调推进在“利益让渡”与“国内优先”之间日益倾向于后者。英国脱欧并非这些趋势的唯一原因，但它确实为“退出多边承诺”提供了一种可被模仿的政治叙事模板。此后，类似的“退出政治”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

（二）区域经济集团的加速分化与“选边站”压力上升

脱欧加速了全球经济从“一体化”向“区域化”转型的趋势。英国离开欧盟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调整战略布局，欧盟加速推进“战略自主”议程，深化内部单一市场并强化对外贸易防御工具；英国则试图通过加入 CPTPP 和寻求与印度、海湾国家签署自贸协定来重构其全球贸易网络；美国则同时推进“友岸外包”和《通胀削减法案》，试图将供应链锚定在“可信赖的伙伴”之间。

这种趋势的直接后果是，全球贸易和投资不再遵循纯粹的效率和成本逻辑，而是越来越多地被地缘战略考量所塑造。各国被迫在不同区域集团之间进行“选边站”——一是优先接入欧盟的监管圈，还是融入印太的供应链网络，抑或是依赖美国的军事和

金融安全保障。英国脱欧本身即是这种“区域化重组”的早期样本，它迫使英国重新定义其与欧洲、美国以及新兴市场的关系，也为全球经济体提供了在大型区域一体化框架之外重塑经贸与合作格局的现实参照。然而，十年数据显示，这种“重新站队”的成本远高于脱欧支持者最初的乐观预期，英国对欧盟贸易占比虽有下降但仍居首位，而对非欧盟市场的贸易增长远不足以弥补单一市场的损失。

（三）主权叙事的复兴与全球化范式的转折

脱欧公投最核心的遗产，或许是它对“国家主权”话语的重新激活。脱欧阵营的制胜口号“夺回控制权”，精准捕捉了全球化进程中受损群体的愤怒与焦虑，将复杂的经济议题简化为“民粹诉求与精英共识”等简单的二元对立。这一叙事框架随后被全球各地的民粹主义运动所借鉴。从美国的“美国优先”到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崛起，从印度的经济民族主义到拉美的新左翼资源国有化，主权话语的复兴成为 2016 年以来全球政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经济学层面，脱欧挑战了“深度经济相互依存必然促进和平与合作”的自由主义假设，它证明了即使在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之间，政治认同和文化边界仍然可以压倒经济理性。这一认知转变促使各国重新审视全球化的收益分配问题，谁从全球化中获益？谁承担了代价？如何在不放弃国际合作的前提下回应国内选民的正当关切？这些问题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它们已经成为塑造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全球秩序的核心议程。

五、结语

英国脱欧十年的复盘，集中展现了重大政治选择背后的成本与代价。对于英国，它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政治选择，凸显了国家治理的脆弱性，脱欧并未如承诺般带来经济腾飞和主权红利，反而使英国陷入了增长乏力、政治动荡和财政困顿的多重困境。对于欧盟，脱欧带来深刻冲击，既暴露联盟内部凝聚力的短板，也倒逼欧盟开展内部评估与制度调适。对于全球，脱欧处在旧秩序调整、新格局尚未定型的时代背景之下，是多边主义承压、区域化重构、主权叙事复兴进程中的重要案例。脱欧公投十年的经验数据表明，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相互博弈的背景下，区域一体化进程虽存在逆向倒退的可能性，但割裂现有一体化安排将产生显著成本，片面依托主权叙事否定多边合作，也往往需要承担高昂的经济与政治代价。



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决策依据。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负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国际，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